

给阿嬷(mà)还是阿嬷(mó)的情书?

□ 孟德宏

截至5月24日,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票房破10亿元。与此同时,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趣味辩论也悄然展开:“阿嬷”的“嬷”字读作(mà)还是(mó)呢,怎么读才最对味呢?

现代汉语字典对“嬷”字的注音标注为(mó),释义多局限于“嬷嬷”一词,特指旧时乳母、老年女佣或西方宗教修女,比如我们熟悉的“容嬷嬷”。因此,“阿嬷”一词,在普通话中标准读音为阿嬷(mó)。至于阿嬷(mà)这个读音,在字典里找不到。但在闽南、客家的方言里,人们称呼奶奶为阿嬷(mà)。

这便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语言学问题:词语的读音,究竟该以大众习惯的“俗读”为准,还是以字典规定的“典读”为纲?

审音从俗从典各有道理

审音从俗,是因为语言的生命在于使用,其读音会随着时间与地域自然流变。社会学指出,“从俗”是字音演变的首要原则。当大多数人都将“说服”的“说”读作(shuō)而非(shuì),将“确凿”的“凿”读作(záo)而非(zuò)时,审音机构往往最终会采纳大众的读法,以“从众、从俗、从简”来适应实际的语言

生活。这体现了语言的民主性与时代性——约定俗成,便是规范的重要来源。

审音从典,是因为规范的基石在于传承。作为权威工具书,字典承担着维护语言清晰度、区别意义与传承文化的责任。例如,“游说”的“说”仍审定为shuì,以区别于一般的“说(shuō)话”,避免混淆。许多古诗词与文言词中的特殊读音也被保留,正是为了维系其历史韵味与文化理据。

从俗从典需寻求平衡

审音到底从俗从典的平衡之道,需要在便利与传承间寻求动态的平衡。理想的规范应既疏导主流(大众习惯),也保护重要的支流(文化理据),在动态演进中保持语言的活力与深度。

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,“嬷”在普通话体系中,它锚定于(mó);在方言口语里,它流淌为(mà)。该电影根植于潮汕地区,展现的是温暖的亲情故事,片名中的“阿嬷”对应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海报,两位“阿嬷”静静拥抱着在一起。

方言语境中“奶奶”的本义,而不是字典中(mó)对应的女佣、修女之义,应从俗从众读“阿嬷(mà)”。

语言是活的河流,既有奔涌向前的“俗”流,也需要堤坝与航标般的“典”范。最好的态度或许是:在公共交流与教育中尊重规范,在日常生活与文化遗产中理解差异,让“俗”与“典”在时间中对话,共同塑造丰富而动态的语音景观。

(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、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)

纸短情长,书写是一种情感仪式

□ 李峥嵘



正在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走红网络,引发

观众情感共鸣。

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——妻子淑柔留守家乡,丈夫木生远赴暹罗(xiān)罗(泰国)客死他乡;而丈夫在暹罗的女性朋友南枝,隐瞒了木生去世的消息,代他给家里写信并寄钱资助淑柔和三个孩子,整整18年。情节看似离我们很远,可那种“被击中”的感觉却如此真切。它唤醒了一种被现代快车甩下的东西:关于等待、关于书写、关于那种“慢”中才能酝酿出的情感浓度。

从口语到笔端:书写改变了情感表达

电影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:主人公在生活中说话都是朴素的。可书信里流淌的却是半文半白的句子——“行船入夜,恰江上升明月,圆如玉坠,仿若身在故乡,似与你并肩共赏”“暹罗虽远,心有所寄,身若比邻”。

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,激活的是不同的神经通路。日常对话时,我们容易脱口而出冲动的话语。而书写需要让思绪沉淀,思考措辞,如何让千里之外的人“看见”你的心

意。正是这种延迟与克制,让情感变得更加浓烈。

中国几千年的书信传统,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仪式。那些“见字如面”的固定用语,就像一种心理锚点,让书写者和阅读者同时进入一种庄重的状态。电影中那些信笺——谈论冬至留一份丸子、新做了棉被、孩子们半夜偷啃番薯——这些琐碎的日常,因为被郑重地书写而变为永恒。

中国人讲究“话浅情深”,言有尽意无穷,正是在这种日常与庄重的张力之间,情感找到了妥帖的安放之处。现在的孩子也许从未收到过信件,父母不妨尝试着写一封亲子交流的信,开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。

等待的美学:延迟满足的情感价值

电影中,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:一封信要“坐”一个月的船,可能遗失,可能被水泡烂。每寄出一封信,就开始等回信。这种等待不是空虚的,而是一种“有方向的想念”——你的情感有了一个具体的落点,每一天都在为那个未来的时刻积蓄能量。

从心理学角度看,这是一种典型的“延迟满足”机制。我至今记得,上大学时,寄给母亲一封长达13页的信后的漫长等待。

母亲说她把那封信读了无数遍。这种体验,是今天任何一条即时消息都无法替代的。希望今天的孩子也能懂“家书抵万金”“鱼传尺素”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的期待与美好。

为什么我们愿意为他人付出

从心理学的角度看,当木生去世,南枝选择隐瞒并替他“想家”和养家,只因不忍摧毁一个女人的希望。这就是共情的最高形态:不仅仅是“理解”他人的痛苦,而是“承接”他人的期待。

南枝的这种行为,在心理学上被称为“利他主义”——不是为了回报,而是出于对“美好”本身的维护。我们需要被他人需要,愿意为值得的人和事付出,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现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对“慢情感”的渴望。我们不需要回到书信时代,但可以试着偶尔放下手机,给重要的人写一封信,孩子可以写给父母、老师、朋友,学会享受等待的过程。真正的深情,从来不是即时的,而是经得起等待的。

(作者系北京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中国青少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科学传播工委副主任)